

見證的碑石

陳芳明

——讀「近三十年新詩書目」

把散佚的，凌亂的，傳說中的詩集目錄收集起來，有系統地編成一本書，讓近三十年新詩發展的脈絡，整齊而清晰地呈露出來，這是值得讚美的。林煥彰的「近三十年新詩書目」，將是日後研究臺灣新詩史的必備參考書。此書的出現，無疑是為新詩在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，尋找到一個固定的地位。從這冊書目，似乎不能看出新詩在臺灣的成就。但是，新詩工作者的努力痕跡，則歷歷在目。

所謂近三十年，當是從一九四九年算起。到這本書出版時為止，應該是二十七年。因此，以「近三十年」做為書名，自然是取其方便的劃分。從一九四九

年以後，政治逆轉使文學的延續遽然中斷，臺灣文學與大陸文學，頓成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。文學命脈的中阻，對於創作者而言，有幸有不幸。一方面是新一代崛起，有獨立自主的機會，造成一個全新的局面，使文學發展不必背負過重的包袱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文學突然斷絕延續，使整個傳統信仰產生真空狀態。內部真空，外力必然伺機湧入。換言之，一位創作者失去舊秩序的依賴時，自然而然會尋覓新的信仰，企圖建立新的價值系統。基此，我們就可瞭解六十年代以後，為什麼臺灣詩壇開始大量的西化，以致造成混亂的結果。經過將近三十年光陰的演變，臺灣

新詩的藝術成就，與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的新詩已有很大的歧異。純就技巧來看，臺灣新詩基本上已跨出了很大的步伐，但是就精神表現來看，臺灣的新詩顯然是萎縮了許多。如果從比較的觀點說，三十年代的新詩重視現實精神，六十年代的新詩講求技巧變化，這樣的區分並不為過。

無可否認的，政治悶局是詩人精神轉向的原因。轉到什麼方向呢？林煥的這冊書目提供了一些線索，可以讓我們看出端倪。例如民國三十八年到四十六年左右，我們還能發現許多富有政治意味的詩集，像金軍的「歌北方」，墨人的「自由的火焰」，紀弦的「在飛揚的年代」，以及上官予的「自由之歌」等等。這些詩集有些是懷舊的，有些是歌頌的；但值得注意者，乃是詩中所表現的現實精神，我們將之視為三十年代新詩的餘緒，應該是可以成立的。然而，詩人並不能只是依靠懷舊或歌頌就可以活下去，他可能會全心擁抱現實，也可能全力批判現實，或者完全迴轉筆鋒，徹底擺脫現實的一切，追求新的，甚至是陌生的生命情調。

這本書目反映出，五十年代中期以後，詩集的名

字逐漸和政治疏離。這暗示了一個事實，凡有關政治現實的題材，詩人儘可能避免去處理，至少詩集的題目逐漸放棄一些蓬勃的字眼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些比較價值中立的書名，或是一些溫柔的，優雅的，沒有傷害性的名字。這是能够理解的，因為自五十年代中期以後，西化的潮流日漸澎湃，極端個人主義的聲音也就在這個同時，迅速淹沒了整個詩壇。個人主義原不是壞的，使它壞的，是詩人個對人主義的誤解和曲解。這種潮流誤導的後果，便是個人完全從社會抽離出來，成為孤立的絕望的自我。當然，這本書目只提供了新詩演進的浮光掠影，如果要進一層去探討詩史的轉折，還必須翻閱每冊詩集的內容。

不過，這本目錄雖然提供了臺灣新詩的一些浮面，我們不要以為它就是不說話的。我們更不要以為，這本目錄把詩集的書名排列得整齊齊，不過是一些枯燥的僵硬的文字檔案。其實，這本書說了許多話，透露無數的消息。

第一、它告訴我們，自民國四十一年以後，臺灣的新詩便開始蓬勃發展了。像三十八年只出版詩集一冊，三十九年有五冊，四十年有十一冊，四十一年有

八冊。但是到四十二年，便躍昇到二十二冊。這個數字顯示創作者的激增，這個數字的背後也表示，關心新詩的人愈來愈多。以後詩集出版的冊數仍有起伏升降，但是我們可以瞭解，新詩在臺灣文學成長的過程中，也漸漸變成一塊雄辯而有力的巨石。

第二、此書告訴我們，每位詩人的創作位置，也就是說，一位詩人的藝術成就可以和其他詩人比較而出。當一冊得到好評的詩集出版時，同年的其他詩人寫出了那些詩集，這本目錄透露了些許消息。舉一個例子，鄭愁予出版「夢土上」時，余光中寫的是「舟子的悲歌」與「藍色的羽毛」，那是民國四十四年左右的事。「夢土上」到今天仍有不少作品讓人傳誦，余光中當年的作品現在只剩下史料的價值。對照之下，鄭愁予在當年的藝術成就，顯然比余光中早熟了許多。從目錄也可以瞭解，詩人的創作歷程是如何演進。以余光中為例，論者恆以「萬聖節」為重要的轉折點，按之目錄，可知那是民國四十九年左右的事；到「蓮的聯想」則完全成熟了，那是五十二年的事；五十八年「在冷戰的年代」出版，是余光中創作的顛峯狀態時期。在目錄的安排下，我們能夠觀察出余光中

是經過多少年，才從萌芽期成長為開花結實的時期。同時，也可以看看同時期其他詩人的成績，例如葉珊的第一部詩集「水之湄」，出版於四十九年，由此我們可以推測，葉珊剛出發不久時，余光中已處在求變的階段了。這是讀這本書目時的一大好處，對研究新詩史實有莫大的助益。

第三，對於新詩初期的發展輪廓，我們也能從這本目錄辨識一些。許多令人懷念的詩集，像方思的「時間」和「夜」，紀弦的「摘星的少年」，林亨泰的「長的咽喉」，楊喚的「風景」，李莎的「零」，黃荷生的「觸覺生活」，又在目錄裏重現於世。這些詩集似乎都值得重估，令人注意的，它們大多是現代詩社出版的；換言之，它們的作者都是現代詩社的成員。我們不能否認現代詩社對臺灣新詩發展的影響，無論是好的或壞的。從目錄中所羅列的，我們不難想像當年現代詩社睥睨四方的局面。

第四，這本書顯示創作的新人輩出。自發展初期以來，新的、陌生的名字便不斷湧現出來。曾經被視為年輕的一代者，又被另一批新的一代所取代。如果每十年可以視為一代的話，那麼臺灣目前的詩壇，大

約有三代了。如紀弦、鍾鼎文等是第一代，余光中、白萩、葉珊等是第二代，羅青、蘇紹連等是第三代。人來人往，潮漲潮落，臺灣新詩成長的速度，說快不快，說慢亦不慢，總是有新人來接傳薪火，正如林煥彰在「自序」說的：「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」。所以，有人宣稱「本詩刊的發展史，就是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史」，說起來很浪漫，也很不誠實，這本目錄正是擊破詩人說謊的最好證據。新詩在臺灣的播種成長，散佈推廣，許多新人貢獻不少心力。我們不要以為他們的名字只在詩壇曇花一現，便否定了他們的努力。記得白萩曾說過，他讀的第一冊詩集是明秋水的「陽明山之戀」，如今這本詩集已不易獲得，但是它對白萩創作點燃火種的事實則不能抹煞。有人多辦一份詩刊，或多出版一冊詩集，便過份高估自己的影響力，這種觀念是相當錯誤的。務必要注意，有時候多出一本詩集，也許對新詩發展產生壞影響就增加一分。今天詩人的悲哀，乃在於他寫詩喘息之餘，又必須拿出另一枝筆來撰寫自己的歷史。撰史之際，貶抑他人時，則義不容辭；為自己辯護時，則揚言「讓歷史來審判」。歷史想必不是如此辛苦發展的，誰在詩壇留

下什麼痕跡，林煥彰在書目裏，誠實實實，清清楚楚，羅列在讀者面前。

總之，這本書目將是日後研究臺灣新詩史的重要資料。現在有一冊目錄在身邊，已可感覺出它的好處了。將來年代湮遠，這本書的重要性也會日益顯著。後來的新詩研究者，一定會因這本書的存在而感到慶幸。

不過，這本書目並非十全十美的。林煥彰在編輯此書時，也承認「沒有受過目錄學的專業訓練」，因此在圖書分類，以及歷史分期等方面，都無可避免有些許缺失。下面願舉出一些比較顯著的錯誤，以供參考。

在圖書分類方面，一些選集也列入「詩集」一欄，像洛夫的「無岸之河」，葉珊的「非渡集」，都應列入「個人選集」類。因為，這兩冊選集都是從他們已出版的詩集中，分別選輯而出。第六十六頁的「選集」與「選集作者及篇目」，算是重覆，可以省去前者。在「詩集」一欄的備註，常常提供許多有關詩集的資料，似可視為詩集的提要，像楊喚的「風景」，備註說明此詩集由光啓出版社再版時，改為「楊喚詩

集」。又如紀弦的「摘星的少年」，改為「紀弦自選詩·卷之一」，讓讀者可以方便地去尋找此書。另外，「笠叢書」、「龍族叢書」、「光啓新詩」等等，也都在備註裏標明，讀者可以瞭解某詩社出版了多少詩集。不過，像「藍星詩叢」、「創世紀詩叢」，此書目便省略了。其實這兩套詩叢包括了許多詩集，頗值得後來者參考，將來再版時，編者或可考慮增補。

「出版資料欠詳之詩集」一欄，恐怕有許多詩集，都應列入「曾預告但未出版之詩集」一欄。像蘇凌的「卜塵」，老兮藍的「摩耶島」等，均屬此類。「詩集」類有些則應列入「出版資料欠詳之詩集類」，像王漢偉的「顛沛詩集」，南宮宇的「海崖集」等均

是。

第六十四頁的附錄「譯成外文之詩集」，其中陳秀喜的「斗室」，並非是自中文譯成日文，而是陳秀喜直接以日文寫的短歌，不能算是新詩。

在分類方面最弱的部份，大概是「海外自由地區新詩書目」，其中把痾弦的「痾弦詩抄」，余光中的「鐘乳石」，夏青的「石柱集」，和沈甸的「五月狩」，都列入香港出版。事實上，這些詩集的發行都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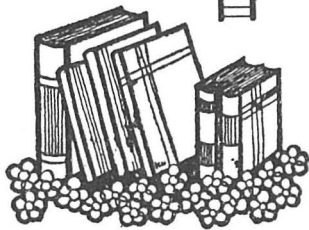
中在臺灣，創作者也住在臺灣，不宜將之列為海外自由地區的詩集。由於編者對海外的出版的情況不熟，所以缺漏相當多的詩集，米軍的「熱帶詩抄」，憂草的「我的短歌」，柳木下的「海天集」，都是香港出版的。林綠到臺灣讀書之前，曾在馬來西亞出版了「我們的歌」，類此情形，這本目錄大概很難收集得很完全。再版時，這方面的詩集必須仔細增訂。初版能有此成績，可謂相當難得了。

在歷史分期方面，編者以「近三十年」為書名，自然是指三十八年以後出版的詩集。因此，像胡適的「嘗試集」，「胡適之先生詩歌年迹」，都可不必列入。否則，啓明書局出版劉大白的「郵吻」、「舊夢」等，都應列入。甚至一般書店出版的「徐志摩選集」、「徐志摩傑作選」，也都應該考慮選入。以此標準來看「全集」類，「徐志摩全集」和「徐訐全集」，均寫於三十八年以前，只是在臺灣重印而已。另外，「徐訐全集」的備註，有「時間何處去」的書名，當是「時間的去處」之誤。

同樣的，在「翻譯書目」裏，也收集了許多在三十八年以前翻譯的詩集與詩論，這些都不應列入「近

新

書



• 國家出

版社新書一批

：「生命的激

流」（董樹藩

著）、「市場

調查概論」（

馬碧秋譯）、「

快樂的人生

」（丘榮襄著

）、「人生無

懼」（劉蘋華著）、「晚霞的超越」（古添洪著）

、「大學生散文」（陳慧樺編著）。

• 大林出版社新書「向恐怖生活挑戰」（大川

博德著）已經出版。

• 慧龍出版社新書「吾妻吾子」（劉慕沙譯）

、「雨絲風片」（孫慶餘、陳曉林著）「郁達夫遊

記」（郁達夫著）、「談文豪」（朱約農著）等均

已出版。

● 鴻儒堂新近出版新書三種：「金錢的故事」

（廖清秀著）、「共犯者」（廖清秀著）及「滾地

三十年新詩書目」裏，如曹葆華的「現代詩論」、「科學與詩」均屬舊書，不能算是在臺灣出版。

本書的書名指的既是「新詩」，那麼像莎士比亞的「十四行詩」，亞里斯多德的「詩學」，甚至拜崙，雪萊等詩集，也都應從目錄剔除。編者之所以會收入這些書，想必是臺灣新詩受西方影響太大了，誤以為西方的詩都是「新詩」。至於像顏元叔翻譯的「西洋文學批評史」，新詩部份的比例並不大，洪順隆翻譯的「中國詩論史」，討論的均是中國傳統舊詩的批評，不宜收入。顏元叔主編的「西洋文學術語叢刊」，又不盡是談詩的，也可不收。

無疑的，「近三十年新詩書目」兼容並蓄地收集各家各類的詩集，已近乎完整地使臺灣新詩歷史的發展概況顯露出來。讀這一本目錄，對於關心臺灣新詩的人來說，可以是一種享受，也可以是一種回顧。詩人似乎比小說家、散文家還會爭吵，但是，來到這本目錄裏，大家整整齊齊排列起來，像一排列兵似的，安靜肅穆地讓今人後人檢閱，希望編者在以後的增訂版裏，能够使那些缺席的——插上，詩人將會感激的，讀者也更將感激。